◈杂　谈

引领经济工作的关键词

关键词1：稳中求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首要工作就是为来年经济形势定调。从2011年开始，来年经济基调均为“稳中求进”。今年这一基调或将继续。

在2015年1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

在近期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稳中求进”。他指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

关键词2：供给侧改革

在不久前的这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这个热词。随后，高层在中央场合密集发声。

2015年11月17日，李克强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1月18日，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再提“供给侧改革”，“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要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12月4日的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上，李克强表示，简政放权，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都是供给侧改革，“就是放手让企业家去创新”。

关键词3：创新驱动

“创新驱动”已经连续两年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经济任务中。

习近平在2015年G20峰会上说，未来5年，中国将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同样去年10月李克强主持召开8省座谈会时，首先谈到的就是深化结构性改革，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相结合，促进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快工业智能改造升级。

关键词4：城市工作

2015年11月就有消息传出，年底中央将召开城市工作会议，这也是时隔37年，中央再次召开城市会议，城市工作在当下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城市工作同样是近期中央财经领导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题之一。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增强城市宜居性，引导调控城市规模，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2016年经济工作的“十大任务”中，最受关注的当属“要化解房地产库存，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

就在政治局会议召开的两天前，国务院还公布了《居住证暂行条例》。

其他关键词：扶贫、“一带一路”

记者注意到，近两年的中央经济会议对扶贫均有涉及。去年，扶贫工作比以往更受关注。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贫困县全部摘帽。11月，中央召开扶贫工作会议，会上习近平表示：“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党委和政府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所以，今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或较以往对扶贫更加强调。

在2014年的中央经济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重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而这也是2015年习近平、李克强频繁外访屡次提及的关键词。由此看来，“一带一路”在今年也是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2015年12月19日《大河报》综合北京/人民网）

◈观　点

供给侧改革应避免的六个误区

供给侧改革本是非常好的改革思路，但由于各种脱离其本意的解读较多，为此，要谨防出现如下误区。

一是将供给侧改革理解为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供给侧改革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是一个新出现的词，但与此相关的供给政策或供给管理、相关理论和实践则早已有之。支持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源头。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改革理论都是从供给侧考虑的，而不是从需求侧考虑的。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实践也并非始自今日，事实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总体改革，九十年代后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等，都是供给侧改革。只要稍微梳理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推进供给侧改革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回归常识。

二是简单用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四减四促”（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促私有化、促市场竞争、促企业家精神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其中多数确也是中国供给侧改革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但由于中国体制具有特殊性，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方面，其中有些政策主张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比它要丰富得多。

三是以政府计划思维推进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本是为解决政府过度干预或过度宏观调控问题而提出的改革思路，但现实中很容易被人误解为通过政府计划或政府主导来确定供给结构，提供供给要素，增加产品供给，提高供给速度。这就有可能走到供给侧改革的反面，不仅达不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反而带来了与过度需求管理政策同样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如政府主导选择产业、产品、项目和技术路线，就会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

四是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从经济学基本原理看，供过于求会导致产能过剩，供不应求会导致市场短缺，而供求均衡是较理想的状态。但有的人将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立起来，以为供给侧改革是对需求侧的否定。其实，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缺一不可，而且二者要尽可能对称和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过去多年来我们过于强调从需求侧进行政府宏观调控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现在强调供给侧改革只是对其进行“纠偏”，而不是过于偏向供给侧而忽视了需求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五是将供给侧改革简单理解为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广义的供给侧力量不仅包括商品或劳务供给，而且包括供给主体培育、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存量调整、增量形成等。若单纯强调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在产能过剩形势下，则只会带来进一步的产能过剩。若广义理解供给侧力量，则会通过改革等，主要依靠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有针对性地解决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让市场出清；另一方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六是将供给侧的生产要素与效率提高决定因素简单平行放在一起。如有的学者将供给侧因素理解为人口或劳动力、资本、土地、创新、制度等。其实，这五种因素并非同一层面因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是生产要素，创新和制度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而且，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与生产要素质的提升是不同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不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而是通过投入量的增加来实现经济增长，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属于要素质的提升，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

除了要素升级外，制度变革、结构优化也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区分不同性质的供给侧因素很重要，因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三大发动机”是更为重要的供给侧因素。其中，制度变革尤为重要，推进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抓住制度改革这个“牛鼻子”，同时通过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2015年12月17日《上海证券报》李佐军）

法治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只有建立起法治政府，才能科学界分政府与社会的权力边界，充分保障社会的自治活力与公民权利的生长。

对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对权利的主张与保护是法治的两大核心主线，只有实现权力的约束才能达到对权利的保护。政府基于公民权利而存在，法治通过对政府权力的规范，既确保公权力为私权利服务，又防范公权膨胀损害私权。所以，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保障公民权利的重中之重。

政府权力能否被关进制度笼子、政府公共治理和管理社会的方式是否合乎法治要求、行政执法对待公民权利的态度、行政部门执行法律法规的效果等，都是衡量国家法治状况的核心要素。可见，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和难点，抓住法治政府建设这一枢纽，法治国家建设便能事半功倍。

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密切关系，决定法治政府是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的关键。现代社会，人们或许一辈子不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打交道，但不可能不与政府部门打交道，行政权乃是每个人生老病死都要直接面对的国家公权。这种关联意味着，政府权力能否依法有效行使，将直接影响公民的切身利益。现实中，从地沟油、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丑闻，到屡治不绝、伤亡人数攀高的各种矿难事故，再到雾霾和水污染等，每一项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漏洞，背后都与政府的执法监管不力有关。政府是实施法律、建构秩序的主体，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普遍性机制，只有建设法治政府，才能为公民权利提供持久保障。

我国社会发育相对滞后，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会限制社会自治的活力，也会形成对公民权利的抑制。在此背景下，有什么样的政府，往往决定了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我们不断强调政府向社会放权，而最终只有建立起法治政府，才能科学界分政府与社会的权力边界，充分保障社会的自治活力与公民权利的生长。建设法治政府是培育法治社会的重要条件，同时，法治社会的建设又反过来助推法治政府建设。（2016年1月11日《京华时报》傅达林）

◈评　论

让官员博士后成为历史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明确指出，博士后申请者一般应为新近毕业的博士毕业生，年龄应在35周岁以下。在职博士后研究人员应以高校、科研院所教学科研人员为主，并严格控制比例。设站单位不得招收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职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

党政官员“不得”在职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这一禁止性规定，或将让众多官员获得更高学历的“希望”落空，也让“官员博士后”这样奇怪的官学组合成为历史。学历本身不过是人才培养的一项制度，并不具有特定的价值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对社会有价值，主要取决于其在公共领域、公共事务中的贡献大小。学历可能是一个标签，表征着“向上的台阶”，但却并不必然有决定意义。既然如此，为何还有那么多官员不辞辛苦、不怕麻烦，不断去猎取更高的学历，乃至连本不属于学历层级的“博士后”也不放过？

在这其中，或许有部分官员有着好学上进的追求，有着深入钻研的兴趣，且特别享受这个不断获取学位的过程。不过，有这样想法的官员恐怕还是少数。道理很简单，真正倾心学问的人，完全可以转身去往学界，而不必仍旧死盯在官场上。说到底，官员对于学历的兴趣，仍在于这学历或将能够帮助他获得更高的权位。

清楚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官员一边忙着繁杂的公务，一边还坚持在职读研、读博、进站研究。比如，此前落马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其学术生涯的起步与其官场腾飞几乎同步，从1996年任职江苏昆山市市委副书记开始，直到2010年任南京市市长，14年来，季建业从处级升迁至副省级的同时，也顺利获得了硕士以及博士的学位，可谓官学同步，步步不落。

尽管目前很难讲官员读博士与权力究竟有多少内在的关联，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群体“在职读书”，显然会比普通学生更方便，其获取学位相对也更轻松。但由此造成的社会影响则不容低估。其一，繁冗的政务与繁重的学习、研究很难兼容，若专心理政，则学业不免荒废；若倾心学业，则政务又会流于应付。其二，大批官员轻松猎取学位，也会降低学位的含金量，甚至会败坏学风。

此番国办明确要求不得招收在职官员，应该说是一次紧急刹车。不仅博士后应该这样做，循此思路，对于在职官员就读硕士、博士，也应该有类似明确规定。学业就是学业，官员就是官员，二者不可得兼，更不能随随便便地“顺便”捞取学位。这不仅关乎学风，同样关乎政风。

官位乃是公器，责在公共利益。能够有权力做很多自己想做、社会需要、公众满意的公共事务，不仅可以成就个体，也是一种难得的荣誉。其实，在我们这个仍带有传统“官学一体”的痕迹的社会里，官员的影响力已经很大，不仅在行政领域，其他包括社会领域、学术领域，同样有官员的“权威性”静悄悄地渗透。官员的存在价值，不一定非要通过亮眼的学位，而是应该通过为公众做更多的事情来体现。退一步讲，即便果真诚心向学，不妨卸掉一身俗务，一头扎进学术大海去，游个痛痛快快，何必两头缠绕？（2015年12月4日《中国青年报》胡印斌）

◈视　界

德国国家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德国学术界，“治理”概念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并通过在前面加上修饰性、限定性词语而衍生出相关概念群，如“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环境治理”“经济治理”等。但即便如此，到目前为止，对于“治理”概念仍存许多歧见。柏林赫尔蒂公共管理学院费德勒教授等人认为，由“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绝非文字游戏，而是反映出公共政治理念的发展变迁，即从权力的单向度强制行使转变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意味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和政府权力的下放。

城镇化发展追求“小即是美”

德国并非到处是高楼林立、人头攒动的大都市，引人注目的反而是特点鲜明、环境宁静的小城镇。德国城市研究所所长马丁说，德国再城镇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而相对较高的城市生活品质是重要的驱动因素。总体看来，德国的城镇化发展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小城镇发展为重点，形成了一个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合理体系。德国有柏林、汉堡、慕尼黑、法兰克福四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有11个大城市圈，更多的则是人口在2000—10000人的小城镇。德国城镇化建设遵循“小即是美”的发展思路，产业政策的重点在于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小即是美”的发展思路，造就了一大批分布均匀、设施完善、功能明确、经济发达的小城镇，既有效避免了“城市病”，又利于实现传统农业型村庄的现代转型。

众所周知，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任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从德国奉行“小即是美”的城镇化思路中获取有益的借鉴。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我国农村人口的转移不宜走向大城市聚集的道路，而应该充分发挥小城镇的作用，以此有效避免“城市病”，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毫无疑问，沿着这一思路发展，必将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新路。

多方协力治理环境

德国的环境治理具有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特点。一段时期内，德国生态环境遭受工业化和战争的双重破坏，环境污染程度世界罕见，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政府开始高度重视生态修复，为此采取了多种手段综合治理环境。其一是采取多层次的环境立法。其中既有特别规定，也有环境单行法以及部门法，此外还有联邦法律体系中与环境密切相关的法律。其二是运用经济调节手段。经济手段包括按照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污染者付费原则”征收环境税，以及根据《欧盟排放权交易指令》而采取的排污权交易。其三是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德国政府依靠先进的生态修复技术，治理土壤污染和河流污染。经过多年努力，终于重现碧水蓝天。另一方面，德国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已经实现了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到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高产出为主要特征的集约型生产方式转变。其四是鼓励多方参与环境治理。德国在环境治理上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其已经建立了政府、企业、公众协力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议会和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全面领导污染治理；生态组织和相关专家为政府的积极治理建言献策；公众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到环境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各个环节；环保NGO参与政府和企业的有关环保规划，代表公众发声。

生态问题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人类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德国采用多种手段综合治理环境，尤其是采取了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来修复、保护生态的做法，值得借鉴。

施行社会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

近年来，福利国家制度在西方遇到困境，在德国也引起争议。尤其是在如何看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德国社会争议颇多。大体来看，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和资方大多倾向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社会民主党和劳方大多主张凸显公平、兼顾效率。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是近年来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坚持社会市场经济传统的同时，大力进行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德国华人教授协会主席辜学武教授认为，相比瑞典、挪威等北欧高福利国家而言，德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相对保守，因而懒汉现象较少。默克尔上任以后，力排众议，坚持“2010年议程”改革计划，最终取得成效。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德国至少比法国领先15年。费德勒教授指出，德国的失业率从2005年的9%左右，下降至现在的6%，其中，东部地区的失业率从先前的20%下降至现在的9%。相比法国的公共财政压力和国债困境，德国失业问题压力小，经济增长质量高，每一点经济增长几乎都可体现为就业机会的增加。

如何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争议的问题。近些年来，以贸易自由化、全盘私有化、完全市场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大行其道。在我国，所谓“市场搞定一切”的观点成了许多人的信条。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确实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用意深远。但是，有些人却借机炒作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只讲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讲政府的调节作用。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讲得非常清楚：“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善良教育”从娃娃抓起

辜学武、旅德学者周坚结合自己孩子的成长经历指出，“善良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其一是爱心教育。爱护动物、同情弱者，是许多德国儿童接受善良教育的第一课。德国的学校和家庭会为孩子喂养诸如小猫、小狗、小金鱼之类的小动物，借以培养他们善待生命的意识。同时会组织孩子帮扶残疾人、为非洲饥饿儿童募捐，培养他们的爱心。其二是宽容教育。德国幼童在入园、入学后，教师将宽以待人的原则作为必修课，并通过点滴事例加以体现。同时，反对暴力倾向，教育学生远离暴力影视、游戏，引导他们近善远恶。其三是公平教育。注重从小对孩子灌输社会公平理念，培养他们关于真善美的判断标准。在德国学校当中，若有学生炫富，往往会受到同学的鄙视。辜学武教授特别指出，德国还成立了联邦公民教育中心，各州设有分支机构。该中心原为去纳粹化而设，以民主化、公民化为目标，定期举办公民政治讲座，发放相关书籍资料，组织青少年到世界各地访问，帮助他们远离激进思想。

现代国家治理既需要廉洁高效的政府，也需要善良守法的公民。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德国根据孩子的特点开展“善良教育”的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启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离不开品德高尚、奉公守法的公民。为此，需要在公民道德教育上下功夫，尤其要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下大力气。（2016年第1期上《人民论坛》孙来斌）